

当代中国学术文库

社会转型时期的 江南士族

任 翌 / 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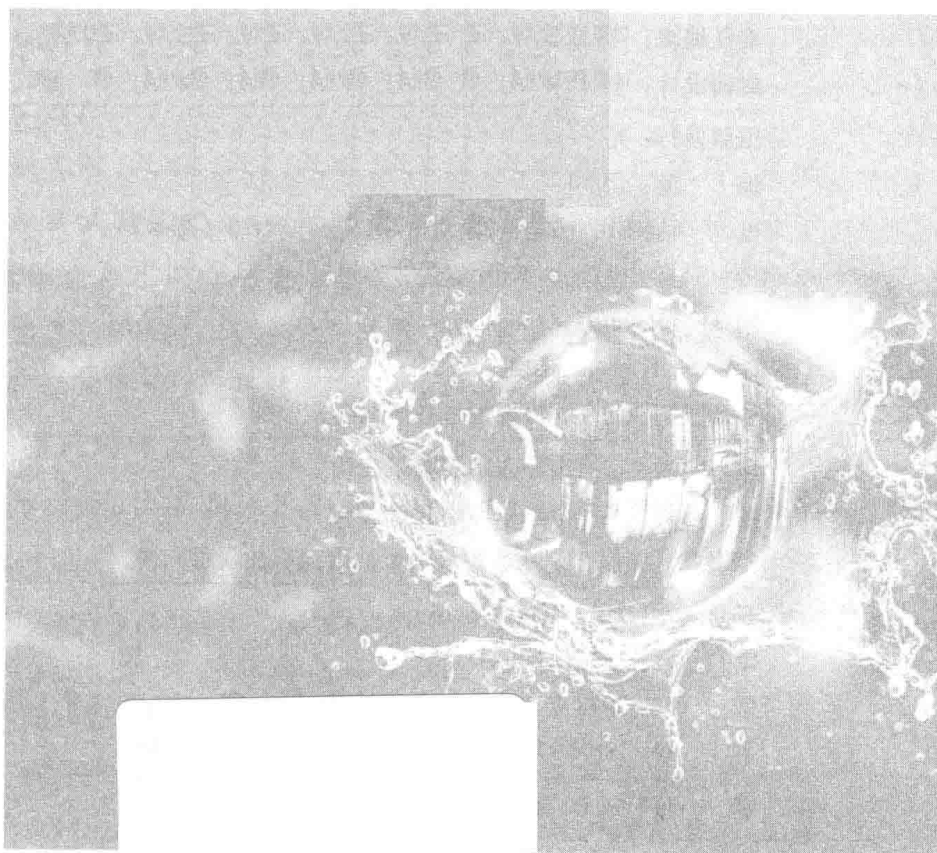
光明日报出版社

非外借

当代中国学术文库

社会转型时期的 江南士族

任 翌 / 著



光明日报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社会转型时期的江南士族 / 任翊著. -- 北京:
光明日报出版社, 2017. 12

ISBN 978 - 7 - 5194 - 3771 - 8

I. ①社… II. ①任… III. ①家族—文化研究—华东
地区—明清时代 IV. ①K820.9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7) 第 313255 号

社会转型时期的江南士族

SHEHUI ZHUANXING SHIQI DE JIANGNAN SHIZU

著 者: 任 翊

责任编辑: 曹美娜 朱 然

责任校对: 赵鸣鸣

封面设计: 中联学林

责任印制: 曹 净

出版发行: 光明日报出版社

地 址: 北京市西城区永安路 106 号, 100050

电 话: 010 - 67078251 (咨询), 63131930 (邮购)

传 真: 010 - 67078227, 67078255

网 址: <http://book.gmw.cn>

E - mail: caomeina@gmw.cn

法律顾问: 北京德恒律师事务所龚柳方律师

印 刷: 三河市华东印刷有限公司

装 订: 三河市华东印刷有限公司

本书如有破损、缺页、装订错误, 请与本社联系调换

开 本: 710 × 1000 1/16

字 数: 323 千字

印 张: 18

版 次: 2018 年 1 月第 1 版

印 次: 2018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 - 7 - 5194 - 3771 - 8

定 价: 54.00 元

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

江南大学自主科研课题，编号：2017JDZD16

“江南地方文化史与家族文化”

前 言

明清社会的转型及其江南士族的选择

明清时期的江南,社会思想和政治经济格局都发生着急剧的变化。在每一个历史的节点,在个体因素和历史合力的双重作用之下,都会涌现出一些杰出的人物作为历史的代言。他们的成功或失败,表面上看是个人的宿命,却又无不是历史的必然。本书正是在这样的历史文化背景下,去考察明清转型时期的江南望族,去探索这些大族士族的艰难选择和文化建树。

如明代嘉隆时期,海禁渐开,手工业商业逐渐恢复和发展,胶山安氏家族正是在此基础上兴起,完成家族的转型。

如明清易代之时,汉族知识分子面对的不仅仅是山河破碎,更痛苦的是在文化和传统割裂之时的进退失据。面对这种文化困境,除了一死之外,通常保全自己内心的办法是退守一隅,顾祖禹父子、恽寿平父子都作如是选择;而如何以退为进,则要付出更多的坚韧和持守。

如到清末科举废止前后,传统知识分子所走的路被封死。在这个大变革时代,读书人群体在社会大潮中的末世挣扎,渐次蜕变为一种新型的存在形态,如近代苏州张氏和无锡张氏的艰难选择,无锡杨氏的转型;而常熟平氏身上,则更多体现在社会转型时期,乡村知识青年辛苦挣扎。

一、产业地主的转型和农商士的融合

明清时期,由于科举制度向下层开放,商品经济不断发展的大趋势,使得江南产业地主有了崛起的可能和上升的空间。以无锡胶山安氏家族为例,其在明代中期前后的崛起,便是江南乡村产业地主转型

的典范,即从农耕地主,到经商致富,再到科举仕进赢得社会地位,完成了江南望族在明代社会中实现农商士的融合,并获得不断成长所需的资本。

明清时期兴起的江南大族,其在修谱立传时,往往会以“扈跸南迁”来追述姓氏来源和祖先迁徙历史,这种模糊记忆的好处,便是可以掩盖祖先来源不清的事实。诚然,历史的大变迁就好比是重新洗牌一样,把曾经的世族打回到贫民,故明清时期重新崛起的大族世族,不管其家族历史是渊源有自,还是来历不清,其崛起的契机大多是“力田致富”,即在江南选择一处水草肥美的地方,垦荒种地,开始产业地主资产累积的第一步,无锡的胶山安氏、宛山顾氏和荡口华氏等无不如此。

在产业地主崛起的过程中,有一个被忽视的现象,那就是“粮长制”。关于这种于明初兴起的制度,后代学者在讨论时,多着眼在其弊,而如果追踪考察其施行的历史过程,则可以发现,“粮长制”在产业地主最初崛起时起过非常重要的作用,这首先就是帮助产业地主在乡间富民中脱颖而出,成为仅次于士绅的一个阶层。

明代的“粮长制度”,是朱元璋在洪武四年(1371)所设立的一种征解粮的制度。朝廷本着所谓“以良民治良民”的原则,来保证国家的田赋征收,但最初为了笼络这些粮长,朝廷往往给予种种优渥的待遇,粮长除了本职“督其乡赋税”(《明史·食货志二》)外,还可以参与乡讼裁定,并有配合里长丈量土地、编造鱼鳞图册等职能。故富民被举为粮长,掌管一地粮赋征收等职责,这反过来无疑又对家族综合实力的提升起着良好的作用。如胶山安氏从第二世开始连续数代都是本区图的粮长,其他如邵宝的祖父“世为开原乡税长”,侯氏先祖侯清也担任粮长一职。每至月初、月半,各区图粮长例行入城进谒知县,商议县中事务。弘治年间连年灾荒,为解决国家财政不足,朝廷许民间赈灾,出粟千石者便可授官,故明代所谓输粟捐官者,江南多有这些有实力的粮长或其子孙的名号在内,如安祚及其子安邦、安国,安邦之子安荣,安国之子安如磐等,都是捐粟授承事郎。

其次,明代产业地主转型为商人,“以末致财,以本守之”,实现

“农商士”的融合,这是明清江南地主(士绅)“三位一体”的经典方式。

明清时期的江南,一直是稻米的主要产地之一。江南出产的稻米,一是专供朝廷,二是流向市场。江南地区的产业地主,起家的资本几乎都是依仗田产。而任何情形下,拥有一定数量的田产,维持稳定的租米收入,是江南地主获得经济自由的根本保障。其次,民间对江南稻米的贩卖活动也很活跃。常郡五邑中的锡邑虽人多田少,出产粮食仅勉强供应本邑,但为巨大利润所吸引,本邑所产稻米仍然大量流出,纵灾荒之年明令禁止都不能绝,故在明代的市场上就已经形成“无锡米”的品牌效应。

但是,要迅速实现资产增值,最为快捷的方式还是经商,如安国在短短二十来年的时间内资产总值达到“约六十倍于所授”,依仗的就是“以末致财”。“起业贩缁乌牧之间”(吕柟撰《桂坡公传》),棉布的贩销,是明代中期以后,江南商人白手起家的常规途径,同时也造就了许多骤而富贵的传奇。

清代乾隆年间的黄印在《锡金识小录》中指出:“常郡五邑,惟吾邑不种草棉,而棉布之利独盛于吾邑,为他邑所莫及。”普通农户“春月则阖户纺织”“及秋稍有雨泽,则机杼声又遍村落”,以所织之布易花、易米及钱,成为普通农户生活的日常。黄印描述市场上的布匹:

“坐贾收之,捆载而鬻于淮扬高宝等处,一岁所交易不下数十万百万。尝有徽人言:‘汉口为船马头,镇江为银马头,无锡为布马头。’言虽鄙俗,常不妄也。坐贾之开花布行者,不数年即可致富,盖邑布轻细不如松江,而坚致耐久则过之,故通行最广。”

明代的江浙商帮及徽商,主要就是以棉布贩销为主业而盈利的。“无锡布”坚致耐久的特点,不仅适销中下层市场,且对从业者的要求也相对低,故在明代时毗邻古运河的南塘街一带花行、牙行集中,林立密布,已经形成商业规模,黄印所言“棉布之利独盛于吾邑”不为虚言。《锡金识小录》还记述了明代隆万间“方媪”的发迹故事:丈夫方昌只有“布铺半楹”,负贩十年才娶妻。丈夫死后,方媪就“坐铺经营”“居

布专售于人”，累积了不少资财。欲招个赘婿，出其女曰：“女貌不俗，针绣足以自养”。待女婿进门后，“出藏金付之，往贾荆湘秦陇间，二十年三致千金”。这里提及的“负贩”和“坐铺经营”，是男子经商和致富的主要途径，而家中女子也能“针绣足以自养”。这个故事生动描述了明清时期江南民间的经济生活。

由上述这些文献记载可见，外省客商对江南的商业活动，在嘉隆时期已日渐繁盛，且无锡作为“布码头”及交通中转站的功能优势已经很明显。

随着手工业、商业的发展，江南民间财富迅即累积起来，“以末致财，以本守之”，使得产业地主迅速成长为豪强地主。但是，单纯拥有土地的产业地主和单纯拥有财富的豪强地主，在封建时代都不足恃，没有政治地位，在经济上也多无保障。如明代中期无锡的安国、邹望和华麟祥等都拥有巨量田产，城中店铺林立，这些豪富为抬高自己的社会地位，除了“输粟纳官”外，还纷纷结纳朝中权要，如邹望结纳夏言，安国之子安如磐则攀附严嵩，在地方上，他们又分别与顾可久之兄顾可学“斗法”。顾可学是退居乡里的官员，曾“炼童男女洩为秋石”进献嘉靖皇帝邀宠（《明史·佞幸列传》），官至吏部尚书。背后有“靠山”的富民与退休官员使钱斗气，无非是争取地方上的势力和话语权。可见，只有通过科举仕途进身为豪绅地主，才能真正拥有政治地位和经济保障。

同理，如果家族中连年科举不第，就会出现家族不兴，乃至不继的局面。这一方面读书从事举业需消耗钱财，另一方面则转型为“读书人家”后，子弟往往耻于“谋稻粱”，故家业迅速下滑。如为天下豪富的安国，经济状况则在六子析产后迅速分解下滑，六子中有的一代而亡，有的二代三代之后便揭不开锅，如长房安如山，科举及第，照耀门楣，但安如山长子安希尧及其两子安绍杰和安绍芳相继卷入科场舞弊案，深陷缧绁，不得不耗费钱财消灾，故从安国至此的第四代以后，就已经凋敝得门庭冷清了。

可见，“农商士”的融合，对江南望族的延续和发展至关重要。

二、明清易代之际江南士人的人生和“职业”选择

一般而言,封建时代的大家族能够顺利走上“农商士”结合的家族发展之路,并能恪守“耕读传家”传统的话,断断续续、起起落落,总能绵延家族的延续和传承;但是若遇到时局的大动荡、历史的大变局,这种以农耕为基础的生活状态和平衡便会被彻底打破。我们所说到的“大变局”,主要是指两个时期,一个是明清易代时期,一个是清末废科举时期。“大变局”时期的江南士人,已经无法选择那种进则出仕、退则园林的进退有据的生活方式,人生出处乃至生存都面临严峻的考验。

毗陵恽南田家族和锡山顾祖禹家族,是明清易代之时比较坚定的胜国“遗民”,家族成员都曾参与“抗清”活动。恽南田之父恽日初(字仲昇),明亡后逃居粤闽一带,后金坛王祁在顺治四年(1647)拥郟西王朱常湖起兵,破福建建宁守之,力邀隐居建阳的恽日初出山。不久兵败,恽日初长子死于蒲城之战,次子死于乱军,三子恽格侥幸保全一命,劫后余生的俩父子回到毗陵老家。而顾祖禹的舅祖即华允诚(字汝立,号凤超),因反抗“薙发令”而被执至南京杀害。顾祖禹之弟曾为福建耿精忠幕,后顾祖禹也前往耿幕,欲与图谋,无功而返,回家继续著书。

此外,从家族思想渊源而言,则恽氏、顾氏都与“东林学派”的思想有着渊源关系。恽日初《东林书院志》(刊刻于雍正十一年)有传,早年曾至东林书院听讲习,又与复社的杨维斗、钱吉士等交游论文,后在张清惠推荐下师从明末大儒刘宗周(《东林书院志》有传)学习。晚年,高世泰复东林书院重开讲坛时,恽日初受邀前往讲学。恽日初作《高刘两先生正学说略》以阐发“刘先生之学,即忠宪公之学”的渊源关系。他认为,高刘两家理学的核心都是“穷理主敬”:

“忠宪先生得之悟,毕生只重修持;会稽先生得之修,末后亟称解悟。忠宪先生以格物为宗,成乎形之谓物,本乎天之谓则;会稽先生以慎独为宗,一于位之谓独,原于性之谓诚。要以穷理主敬,用各有当而进,实相资孔门之

博约也。”

恽日初在体悟“高刘”性理之学时有所得而发挥之，屏居武进时即授徒讲经，但绝不传子孙应试之学。

顾祖禹之父顾柔谦，少时随舅父华允诚读书，后师从马世奇，华、马二人《东林书院志》均有传。华允诚是高攀龙的及门弟子，亲聆高攀龙教诲，并与高攀龙一起在首善书院讲学。马世奇是东林后学，其父是“东林八君子”之一叶茂才的门生。

这样的家族历史和思想渊源，使得这些东林后学在明清易代之时都以“气节”相高，落落寡合于世。但与诸多殉节的前辈师友比，他们选择的是坚定地做“遗民”；其生存的方式，顾柔谦、顾祖禹相继以做塾师勉强养家，而恽南田则以书画自存。

读书人在清贫难举时，为生存计而选择做“塾师”，这几乎是明清时期读书人最为普遍的“职业化”选择，这除了勉强维持生存外，也可以继续读书应举，甚或寻找“人脉”机会。如易代之际，顾柔谦携家人遁入山中，垦荒之外做村塾养家。入清以后，顾祖禹也相继给钓渚范氏、无锡华氏、昆山徐氏做塾师。此外，更为重要的是，顾氏父子“以文献之家”自任，整理疆域舆图，研究地理形势以备战守之用，这是顾氏父子的大志和著书立说的动力。顾柔谦认为明代的读书人，除了习制艺八股、空谈性理之外，对于国家舆图范围内的疆域形势、关河险要，大多知之甚少，语焉不详。如此，一旦遭遇巨变：

“举关河天险，委而去之，曾不若藩篱之限、门庭之阻哉？”

明清易代之时的“遗民”，当“苟存性命于乱世”时，多以著述和文献整理保存等学术活动，自觉担当文化传承的责任，顾炎武、屈大均、顾祖禹等莫不如此。与顾柔谦、顾祖禹父子之存文献于乱世的责任感相比，恽南田之以书画自存，更关乎个人于乱世的生存，但从“转型”的角度去考察，这种选择却更有典型意义，代表了文人在弃绝读书做官

这条路后，走“职业化”的性质道路更明显。当然，这种选择也取决于江南士人的文化累积和惯性。

首先元明以来，江南文人渐形成“游于艺”的生活习性。

在他们的日常艺文活动中，有三个主要特征：一是当时的江南文人已渐成为“诗书画”兼善的综合艺术创作者，如元末的倪瓒、杨维桢为代表的江南文人群体，及入明以高启、张羽、徐贲等为代表的“吴中文人”群体。二是在绘画艺术作品中，形成了“诗书画”相结合的文人“写意”的传统，尤以倪瓒为代表。三是元明时期的文人又大兴结社和雅集，文人的集会也成为鉴赏古字画、即兴挥毫泼墨和诗词唱和为内容的综合性艺文活动。加以江南的富足，使得江南文人能够在一定程度上游离于体制之外，高蹈地“游于艺”而得到精神上的自由和满足，如高启所唱：

“不肯折腰为五斗米，不肯掉舌下七十城。但好觅诗句，自吟自酬赓。”
(高启《青丘子歌》)

其次，被动地将“游于艺”职业化。

明清易代之时，战乱加上匪盗纷出，大量江南地主迅速破落，如顾祖禹提到其外祖父家，本有百亩之地，因苛税、灾荒和匪盗抢掠，难以为继，只能弃田遁入虞山中。失去土地的保障和对皇权的依附，如顾祖禹父子只能以垦荒种地并给人做村塾师勉强度日，而恽南田则开始将“艺”作为生存之具，供养父亲及家人。

明清时期的江南文人，在科举之途走不通的时候，以一“艺”之长谋“稻粱”，已屡见不鲜。如久试不第的落魄文士多“游幕”者，或者到州府县衙做吏，或者入将军都督之幕府做门客，都具有职业化的倾向；而如恽南田辈与之不同处，直接被抛向社会，面对不可知的市场。

但易代文人以“画艺”为业时与专业“画匠”还是有所不同，他们依然保持此前那种“游于艺”时的闲淡高逸心态：会友，赏心，诗意栖居；可为知音挥毫，不给“俗客”展纸。这种心理惯性和“文化”上的清

高,好的一面在保持书画艺术的纯粹性和传统的审美特性;不好的一面则是放不下身段的易代文人,依然难于解脱窘困的生活状态。恽南田晚年时,其“南田画法”尤其精湛,画艺盛名于当时,但以金币乞画者,非其人则不与,所以“风雨常闭门饿”(《清史稿》),死时竟贫不能葬。这也是转型期文人的尴尬:自我身份认同的模糊。

由于绘画之法更近于“技”,故恽南田身后,恽氏家族及毗陵一地传承“南田家法”者颇多,清代中期以后渐形成有名的“毗陵画派”(或称“常州画派”),人数有近二百人之多,其中恽氏子弟有三四十人,且向苏松常周边地区辐射,形成“家家正叔,户户南田”的局面。这种气象,一方面表明了江南人文风雅之盛,另一方面也是江南地区书画市场活跃的象征。明清时期,书画创作和书画市场已经形成良好的互动环境,这也正是江南文人能以“画艺”自存的条件。因此,越到后来,文人的书画创作顺应市场化需求的趋势越是明显。

三、清末民初科举废除前后中下层读书人群体的出路与转型

清末废除科举,是又一个历史大变局时期。光绪三十一年(1905)九月,清廷一纸上谕,“所有乡、会试一律停止”,长期以来一直被视为“恶制”的科举制度终于寿终正寝。“国家最不利之事,在人人皆思做官。”(《光绪政要》卷三十一)“停罢科举”,固然断绝了所有读书人一门心思只走科举仕进之途的念头,但仓促定制的结果,也同时把处于科举制度下层的举人、生员、童生抛向了社会,令数百万读书人陷入一种无所适从的境地,任由其挣扎。这个挣扎的过程是很漫长的,如吴县张氏、无锡张氏及杨氏,还有常熟平氏等,都是转型裂变时期的很好案例。

清末民初,中下层读书人群体的构成,主要有两个层次,一个是已跨入体制门槛的举人、进学的生员所构成的准官员群体,一个是尚在体制门槛外徘徊的童生和普通读书人。按照费孝通先生的观点,举人、生员也是属于享有权利的士绅阶层,(有免除差徭,见知县不跪、不能随使用刑等特权),科举废除,固然对这个原先的优势阶层有很大影

响,阻断了他们的仕进之途,但并不能说完全堵塞了他们的上升空间。首先,这些人中的佼佼者常常通过各种途径参与社会变革;而际遇不济者或回归乡土,重新做回地主乡绅,一定程度上依然参与基层社会的管理。其次,有能力者或其子女,可以去城里进洋学堂读书,甚至出国留学,回来后依然可以占据社会的上层。所以,废科举的谕令下,举国若狂的局面并没有应声而起,这很大一方面的原因正在于此。除此之外,还有一个容易被忽视的原因,就是江南地区的乡绅阶层,在清末社会转型的过程中,能较快地适应变化。

明代以来,江南地区商业、手工业发展的良好环境,正是科举取消前后江南读书人群体转型较快的原因。这种情形,在清末咸、同以后更明显,如无锡荡口华氏和旗杆下杨氏为代表,特别是江南中下层的“游幕”文人,对自己的前程有着较为主动的选择。

第一类是在“士农商”之间进退裕如。

无锡荡口华翼纶(1812~1887,字赞卿,号邃秋),是道光二十四年(1844)的举人,后三试不第,直到1851年,因亲家无锡鸿山邹钟泉擢升为广西巡抚,于是随之去广西。华在去广西前或已捐了一个候补知县。

华翼纶到广西后,进入荣禄的伯父、天津镇总兵长瑞幕府,《太平天国史》记载华氏:

“咸丰元年夏,应天津镇总兵长瑞邀,入其幕,赴粤西参赞军务,从大学士、钦差大臣赛尚阿会剿太平天国于紫荆山、永安州等处。次岁二月十九日,长瑞等四镇大败于永安城外大峒,四镇皆死,幕府散,翼纶还乡里。”

“太平军”祸起,华翼纶想走参赞军务谋图发展之路,破灭后即回到家乡。在华氏宗谱中记载,回乡后的华翼纶即经商。三年之后,因前之击“粤匪”之功,授江西吉安府永新知县。但是咸丰六年(1856)三月初,太平军攻克吉安城,进军永新,不久即占领永新县城,华翼纶“以永新失守,革职在途”。恰闻母丧,便借口奔丧而归。直到咸丰十

年(1860)三月,太平军攻破江南大营,长驱直达无锡苏州,华翼纶等组织团练,并得到李鸿章“淮军”支持,联合四乡抗击太平军,后即奉命督办常熟、昭文、无锡、金匱、江阴团练。“太平军”战火息,华氏又继续经商。

华氏是无锡荡口世族,家族中文化和产业都颇有积累,也是明清以来有实力的江南乡绅地主。华翼纶在“习文、求仕、殖产(经商)”之间进退裕如,这与封建时代读书人的常态人生不同:一是并不专事举业,出则仕,入则亦学亦商,有较大的自由。二是仕与不仕,在很大程度上也由自我发展的目标定位和官场的生态状况来主动选择。这种情形在江南地区的读书人中具有一定的代表性,探究其原因,除了宋元明清以来长期形成的良好的商业经济环境外,东林学术之经世致用思想的影响也是一个重要因素,两者结合,体现在大族家训中便有诸如“士农工商所业虽不同,皆是本职”。(《荣氏家训十五条》明)或如武进盛隆“人范须知”对家族子弟所要求的:“至十五六,然后观其质之所近与其志向,为农、为工、为士,始分其业。”正如安希范所云:“士农工商各占一业,尽心力而为之便不虚废此日。尽心力而为之,纵不能为善,亦不暇为恶。”(《我素公独语》)在这种社会环境下成长起来的旧时读书人,就易形成一种较为融通开放的思想,所以一旦时局变易、社会转型,这些人比其他人更易于实现自身的转型发展。但他们的“职业”选择,基本上还是具有传统从业的性质,如华翼纶经商,主要还是在无锡地区明清以来逐渐成熟的“米市”“布码头”的基础上,开设商铺,在城里从事堆栈业、仓储业等。

第二类,追随洋务派领袖,完成近现代工商业者的转型。

与华翼纶不同,曾经一同前往曾国藩处搬救兵的杨宗濂(1832~1905,字艺芳,晚号潜斋主人),也是在平定“太平军”之乱中以兴团练而起家,随后以“濂”字军加入淮军,一直追随李鸿章平定捻军等清末诸乱,以军功立身。此后,杨宗濂和杨宗瀚兄弟一直是李鸿章“洋务运动”麾下的得力者。

李鸿章担任直隶总督时,委派周馥、杨宗濂兴办天津武备学堂,这

是中国第一所陆军军事学校。学校仿德国军事学院创制,以培养新式的军事人才。杨宗濂担任学堂第一任总办,表现出超强管理能力,其详采兵法编成的《学堂课程》八卷,后来即成为各武备学堂的教程范本。光绪十二年(1886)杨宗濂与吴懋鼎等人在天津合办火柴厂,这是杨氏最早从事的实业。在轮船招商局任职的杨宗瀚则于光绪八年(1882)赴台佐理巡抚刘铭传在台的洋务活动,兴办商业,筹建台湾铁路。光绪十六年(1890)奉李鸿章之命总办上海机器织布局,这是中国近代第一家棉纺织企业。至1895年,杨氏兄弟终在无锡东门外创办“业勤纱厂”,这是近代无锡第一家民营企业,自此掀开了无锡近代工商业发展的大幕。

同一时期,无锡张氏的张叔和,则在近代城市园林建设和管理上翻开了新的篇章。张叔和早先入洋行做帮办,后受李鸿章委派,进入轮船招商局任帮办,负责漕运。后又入台湾招商局,负责在南洋等地募集资金,招商引资,成绩卓著。张不久因故离开官场,在上海置地建著名的张园。张园是近代园林的杰出代表,建筑风格上中西结合,功能上则集花园、宴饮、游艺等于一体,管理上委派西方经理人进行运作和经营,并免费向公众开放,成为清末民初“遗老”雅集遣怀、新进人士集会演讲的场所,因其公开性和包容性,成为近代意义上的“海德公园”。

第三类,入幕文人从以“术”存身转型为学者型人才。

清末民初,在科举废除前后,江南中下层知识群体选择出路的方式,最多的还是“入幕”,即进入清末四大“幕府”(曾、李、张、袁)做“幕客”。

按照传统的说法,“入幕”即所谓做“师爷”,这在明清以来的江南地区中下层读书人中已是很多见的职业选择。民国时期刘成禺在其笔记《世载堂杂忆》中有一段记载,描述了张之洞幕府中多用各有专长的常州府人:

“无锡张曾畴擅苏体字,为之洞代笔,几乱真。赵凤昌以通达政事文章

名，之洞倚之如左右手。金匱华蘅芳以算术独步，两湖奉华氏为泰斗，在鄂十余年。……他如杨模等，皆幕府才也。”

在刘成禺提到的数人中，张曾畴在张幕充任文案时间最长，长达十七年，一直伴随张之洞至去世。据刘成禺所云，张曾畴进入张幕是因为擅写一手“苏体字”，故一直为张之洞代笔。在张幕中，张曾畴也最像旧式“师爷”：忠诚勤恳，恪守本分，善始善终。其见载于文字者，大致主要是管理张府的生活事务，直至张之洞离世。

其外甥许同莘(1878~?)字溯伊，21岁即由张曾畴引入张幕做事。后许写有《公牒学史》，书中首先阐释了做“公牒者”的基本素养，所提出的“积学”“晓事”“立诚”“得中”“养耻”等质素，具有很浓重的旧式幕客的特点，故有人把许同莘一类称为“最后的师爷”。

次则如同在张幕的华蘅芳(1833~1902)，字若汀，是前述荡口华翼纶之子，幼时无意于时文举业，独好数术。与之相似的还有无锡前洲人徐寿(1818~1884)，字生元，号雪村。徐年轻时也认为举子业“无裨实用”，解决不了生计问题，遂弃去，转而攻实学。加上“少好攻金之事，手制器械甚多”，开始钻研科技。华蘅芳后来与徐寿相识，两人一起于1853年结伴前往上海寻求新知识。在英国传教士所创办的墨海书馆，他们结识了在书馆从事西方近代物理、动植物、矿物学等书籍翻译的李善兰。在李善兰的帮助下，两人选购了一批西方近代科技书籍和化学、物理等试验器材，通过自学，“究察物理，推考格致”。

清末大兴洋务之时，徐寿、徐建寅父子跟华蘅芳一起，以“研精器数、博学多通”被曾国藩征聘入幕，1862年进入曾国藩创办的安庆内军械所，华蘅芳负责“推求动理，测算汽机”，徐寿负责“造器置机”和制造小样，终于在1862年7月研制成功我国第一台蒸汽机，中国近代工业的发端由此开始。1866年，在徐寿、华蘅芳主持下，在南京金陵机器制造局研制成功第一艘蒸汽动力船——“黄鹄”号，中国近代造船工业也自此开始。

后来，徐寿、华蘅芳又被曾、李委派筹建“上海机器制造总局”，并

在制造局所设翻译馆内一起翻译西方科技书籍。此后，华蘅芳一直以担任“教习”为主，先后被聘为上海格致书院教习、天津武备学堂教习，在张之洞“两湖书院”“自强学堂”任教习的时间有十多年之久，晚年回到家乡，在“瑛实学堂”做教师。华氏一辈子教书、研究、著述，是个真正意义上的学者和教育家。

刘成禺《世载堂杂忆》中还提到“幕府才”杨模(1852~1915,字范甫,号蛰庵),是无锡学前街人。同治十一年(1872)中秀才,光绪十一年(1885)被选为拔贡。杨模先入李鸿章幕,跟华蘅芳一起受聘于天津武备学堂任教习;后又入张之洞幕,襄办“自强学堂”,任教习。不久,杨模回到家乡,与数位同人一起集资购置无锡连元街“上寿禅院”旧舍,在清光绪二十三年(1897)创办“瑛实学堂”,并于次年建成招生,华蘅芳担任总教习,这是无锡第一所新学堂。同年,裘廷梁、吴稚晖等人创办“三等公学堂”。很快兴新学之势便如雨后春笋,1902年胡雨人在堰桥办“胡氏公学”,严毓芬在张泾办“严师私立经正学堂”,周舜卿办“廷弼商业学堂”等,这些都是科举正式废止之前由私人兴办的新学。

三则如刘成禺提及的“以通达政事文章名”,并被张之洞倚为左右手的常州人赵凤昌一类,是近代史上有名的政治干才。这一类人如战国时期的“谋士”一般,以智慧和洞明世事的本领参与机要,如出身低微的赵凤昌后来被称之为“民国产婆”;本书所记的吴县张一麀、无锡杨味云、薛福成等也是属于这一类人才。不过,赵凤昌、张一麀还是以“老秘书”终其一生,杨味云则以精财会而成为民国时期的财政专家,晚则转而从事实业管理。而薛福成与他们的差别,则是在近代外交和政治思想史上贡献了其特殊的意义。“经世致用”的思想和实践方面,都具有当代的意义。

薛福成(1838~1894)字叔耘,号庸庵。薛氏青少年时经历太平天国之乱,转而钻研实学,究讨时弊。同治四年(1865)投曾国藩幕府,以《上曾侯书》万言书,提出“筹海防、挽时变”等八策而赢得曾国藩赞许。入曾幕8年,在“兵事、餉事、吏事”方面得到历练,是当时“曾门四